



# 從教育及文化人權談學風

●林玉体／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人權」代表人性尊嚴，在為學求知上，也是「學術自由」面貌的展現。具體而言，那是讀書人（intellectuals）的風骨。學風足可稱許，這種國家或社會，必定孕育出足以傲人的成就與表現，也是道德（公）及倫理（私）的極致境遇。評量世界各國或歷史上各時間上的文化（或文明）水平，這是最基本的要項，且是最穩固最長久的國力保證，他人絕不敢輕侮，學子也最足以自豪。

求知是人的基本本能，進步的政府與民間無不尋求各種方式來滿足此種需欲。最明顯的一項有形設計，就是規劃良善的學校制度，來激發人類的潛能。放眼看看目前超強的國家，無不把學校教育列為施政重點。歐洲自文藝復興以還即稱雄於世，「西元」已變成「公元」，各種制度及理念已成普世價值，之所以如此，中世紀的大學（medieval universities）於千年之前即已立基，居功殊偉。日本本為鎖國國家，但1868年明治維新時採教育家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並且天皇登基只九年之後（1877），即設立東京帝國大學，其後高等學府陸續林立，學習歐美大學注重學術自由之傳統學風，大學與另兩個權力單位鼎足三立：university, church, state，猶如政治上的三權一般，遂造成日本在國力上輝煌的成就，在舉世大學排行榜上擠入二十大之列，屬亞洲之冠。反觀支那呢？這個「古國」但不必然「文明」，在學校教育上就乏善可陳，「自我感覺良好」的「書院」頂多是科舉的附庸，學風卻敗壞得不忍卒睹，稀有的「風骨」之士，皆以悲劇終，涓涓細流怎能聚成主潮？流風所及，現在的中國是壓制自由思想的地區，真正的精英份子，百年來都是留學歐美者，哈日者也不計其數，此種學風，台灣也不例外，的確可悲！

今年的國際人權日，台灣在教育及文化上可供談資的，至少有下列三項傷害了學風：

- 一、大學排行榜這幾年變成最醒目之教育新聞之一，2008年，台灣大學立校八十年，當年迄今，台大及台北重要角落，都可以看到醒目的標語：「八十台大，前進百大」。日本治台期間，明治天皇不只在日本林立各帝國大學，也在佔領台灣約三分之一世紀（三十三年）之後，在台灣成立台北帝國大學，即當今台大的前身。假定日本政治勢力不退出台灣，中華民國尤其中國國民黨不流竄到台灣來，則台灣大學的世界大學排行榜，很有可能已入五十名之內了，更不用



說「百大」。當然大學排行榜並不絕對正確，但可供參考。或許中國上海的交通大學所做的大學排行榜甚具意義，一來那是中國的大學自己做的，二來該大學取六個較為客觀的指標作為評準，可靠度較高，相信關心此事的學界朋友皆知悉此事。這幾年來該大學所做的排行，東京大學名列全球前二十名之列，在亞洲名列前茅，中國及台灣的大學，連百名皆未入列，不過，台大是二者中名列第一的，遠勝中國的北京，清華等「名」校。這方面台灣學子或許稍堪安慰，但比起日本，台大卻差了一大截，更不用說其他大學了。2008年時，中央社要我寫一短文論述台灣的高等教育，我靈機一動，乃以「八十台大，何時百大」為題，依大學史角度評斷要是台灣自1895年迄今仍在日本治理之下，相信1928年立校的天大，早已在全球五十名之內了，因為東京帝大（現在的東京大學）數年來都在全球二十大之內，而京都等其他「帝大」也在五十名之內的。台大與當時日本的「帝大」水平相差不多，因之作此種推論，「有效性」甚高。不意我那篇短文因為傷了馬政府顏面，他上台後竟悍然的拒絕刊登，政治力之干擾發表自由又多了一樁。學術研究應有憑有據，不可無的放矢，而取歷史作為佐證是推測未來最可遵循的想像力。若以學術研究最登峰造極的頭銜為參照座標，難道又有誰敢否認日本的大學教授獲諾貝爾獎人數是亞洲首位嗎？今年又有兩名日本教授榮獲諾貝爾化學獎。不虛心檢討只狂妄的自我吹噓（hybris），必得報應。日本大學的表現也不得不使一些大中國民族情懷根深蒂固的儒學人物負笈東瀛，造成一股「哈日」風。孫逸仙、蔣介石、梁啟超等不也都是留學過日本嗎？

台灣未提供優秀的學校設備及師資，也無法保障學術自由，下一代哪能呼吸正常又優質的學風呢？就階段性而論，台灣先向日本大學看齊（戰前的日本是極權國家，但戰後已是世界一流的自由、開放又民主的國家了）。

- 二、今年有些大學學生社團做了各大學生參加政治活動的自由度調查，發現不少大學竟公然的禁止大學生遊行示威走街頭，印證了自由路的坎坷、崎嶇與波折。似乎1987年之前的戒嚴幽靈再現，白色恐怖重返校園。研究學生運動歷史者皆知，大學生尤其是優秀的大學生較具理想性，加上心理上的叛逆性，是造成社會波動與震盪的主因。心理學家曾說過，一個人活了十六歲不反社會，這種人沒有「心」。大學生之不滿現況，依性質不同可分三層，一是對課業安排，學習內容，教學態度，學校設備，分數評比不公等表示異議，這是教育改革及進步的現象，卻是厚植其日後充當國家棟樑最不可或缺的發動機。實在應正視之，且妥善處理，以備「正用」；第二層是對學校行政措施有意見，如宿舍規定、圖書館開放、學校活動的舉辦等有他們的主張，過去的髮禁就是最顯著的例子。這二層都是校內的，也直接與教育有關，這也是學生應關心「公共事



務」的份內職責。第三層就針對校外了，如政治腐敗、民生凋敝、環境汙染、生態失衡、弱勢人群遭欺、原住民文化橫遭蔑視、治安不良、政黨惡鬥，甚至戰爭與和平之抉擇、選風之惡質及主權之喪失國格之淪落等，這些雖與教育無直接關係，卻正是發揮「公德心」的最佳時辰，也擴大了學生視野，以寰宇蒼生為念的最重要人生觀之挑戰。大學史也告訴我們，只有一流的大學生才勇氣十足的走在人群前端，為民喉舌，為百姓喊冤，為公義挺身而出，只有不入流的學生才讀死書，躲在象牙塔內不食人間煙火，不過問世事，一副冷漠疏離的心態，這種大學生的確是生病了，為政者竟然與之同夥，成為「反教育」最壞的楷模。只願「咨爾多士，為民前鋒」，自己才坐享其成，試問此種貨色，或由這批庸才構成的學風，不就是危及人權的最大元凶嗎？大學了，大學生也都是成人公民了，他（她）們都享有政治權，投票決定人選時難道要在「無知」或受騙之下來抉擇嗎？古代的大哲 Aristotle 把人定義為政治的動物，政治且包山包海，大學生可以置身度外嗎？孫逸仙也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難道大學師生不是眾人之一嗎？沒錯，政治或政黨這個領域，猶如宗教派別的信仰，極其複雜，但先進國家已建立的一種準繩，就是中小學不談政治，也不言宗教，但大學了，總該「面對現實」吧！可以逃避嗎？且以認知發展層次來說，當代瑞士的名心理學家 Piaget 不也說，那已臻理性運作期了。關心政治議題，不正是磨練他們運用冷靜的分析力及批判力來使真相越能大白之際嗎？

- 三、現在的台灣執政當局一味的親中，在教育文化上還落實的以獎助金幫忙中國來台的文化、傳播、新聞、藝術、音樂或體育人士，台大更明目張膽的要求各學系、學院負責募款，還明確的以一年四十萬台幣給碩士班學生，五十萬給博士班學生，另有住宿、醫療、求職、考試等各種優待辦法。相較之下，台灣本土學生不只變成次等學生，且心態上形同中國學生或藝文人士的奴僕，或許台灣學生得向中國學生服務方能分一杯羹了，並且從中國來的該種人士，在未開放之前即未訂 ECFA 之前，人數不滿百，今年開放後，已達二十萬之譜，這的確是人神共憤的掏空台灣教育文化財及資產最不能耍賴的證據。奇怪，號稱為台灣高等學府龍頭的台大，對於馬政府的此項政策，怎麼逆來順受，甚至順水推舟。當年傅斯年捍衛大學自主的作風哪兒去了？而台大的教授們也未見反彈，台大學生似乎是噤若寒蟬。當局怎麼囂張到此種地步，真令人不寒而慄。台灣的文化界及教育學術界如任令坐以待斃，那真是咎由自取，卻是「千古罪人」了。馬政府吃夠台灣到此一令人髮指的地步，現已激起台灣人極強烈的反彈，但「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正本清源之道，實在應該用選票把他唾棄。藝文界及教育學術界有人走上街頭表示憤怒，甚至口出惡言，意外的獲得群眾的迴響。罵人三字經，通常狀況下，這是一種侮辱，表示教養不足，猶如取刀殺人一般的不該。但受過一定程度教育的人只看表相膚面嗎？試問革命有理嗎？歷



史上不少革命被世人欽敬，革命烈士或愛國英雄，不是採取流血手段嗎？狗急都會跳牆了，人急當然就造反。鄭弘儀這位名政論節目主持人因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在公眾集會中口出不雅之語，竟然引來移山倒海似的圍剿。當年孫逸仙以「驅逐」及「消滅」為號召，中國國民黨以「殺朱拔毛」、「消滅共匪」作為全部教育的主軸，手段比三字經更蠻橫萬倍。一位受無理性侵的婦女，還苛求她要斯文優雅嗎？雖然為達目的，可以不擇任何手段，這種 *aims justify means* 可供評論，但更具意義的是行為之動機，那才是具文化素養都該有的德操吧！可以眾目怒指咬性侵兇漢一口的淑女而讓那位得逞者在旁咧齒嘻笑乎！天理又何在？標榜「博大精深」的儒學傳人，是以此自矜嗎？這就逼使對方以武力拳頭見真章了。當年大清帝國末年如何之歧視異邦，結局是惹來幾乎亡國的羞辱，此種史訓似乎馬政府當局充耳不聞。其實台灣海峽兩岸之作風是如出一轍的。劉曉波只為文提《零八憲章》，共產黨就以囚牢伺候，他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其實更該得該獎的是台灣的鄭南榕、詹益樺、林義雄等民主先輩。前二者以自焚抗議中國國民黨，後者則母女被慘殺身亡。試問此種社會哪來安詳？反抗者採取的手段比三字經更為激烈！尊嚴人權之爭取，才是癥結之所在！

船過水有痕，上述三件只是今年（2010）台灣人權在教育、文化及學風上令人憂心如焚者，謹草此文為台灣歷史做見證。◆